



上海旧事之 跷脚沙逊

夏伯铭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Shanghai East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旧事之 跷脚沙逊

夏伯铭 著



K295.1
XBM



上海遠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旧事之跷脚沙逊/夏伯铭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ISBN 978-7-80706-723-8

I. 上… II. 夏…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史料—近代②沙逊—传记 IV. K295.1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1837 号

责任编辑:郑西海

封面设计:王 琤

版式设计:李如琬

上海旧事之跷脚沙逊

著者:夏伯铭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字数:367 千字

印张:20.5 插页 1

印数:1—5100

ISBN 978-7-80706-723-8/K·77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55

作者前记

凡是年仅古稀的老人或者对旧上海历史稍感兴趣的中国青年,在经过矗立于南京路外滩的和平饭店时,都知道这座国际著名的饭店在解放前叫华懋饭店,而和平饭店所在的大厦解放前叫沙逊大厦,建造沙逊大厦的是一个名叫“跷脚沙逊”的英国人。一些人或许还知道,这个“跷脚沙逊”的真名实姓是埃利斯·维克多·沙逊。至于有关此人的进一步情况,许多人恐怕就答不上来了。无怪乎有位作者叹息地写道:“30年代的沙逊在上海似乎除了造房子,还是造房子。他在上海的生活究竟怎样的,人们一无所知。”

我们很容易找到维克多·沙逊在旧上海留下的众多标志性建筑,诸如现为锦江饭店的华懋公寓和格林文纳公寓、位于苏州河北岸的河滨大楼等等,但我们很难找到与他个人有关的可靠材料,无论是书面的,还是网上的。随着近年来人们对旧上海兴趣的日趋浓厚,一些作者自然不会放过“跷脚沙逊”这个传奇人物。可是,由于原始材料的缺乏,他们只能人云亦云,甚或胡编乱造,许多说法彼此矛盾,离事实相去甚远。

就拿“跷脚沙逊”的脚究竟是怎么“跷”的来说,就有多种说法。有的说他“赌博跑马,从马背上跌落,左脚受伤,留下残疾”;有的说他“在战争中因伤致残,坏了一只脚,走路一瘸一跛”。其实,他是在飞行训练中因战机失事而致残的。

维克多·沙逊被人们尊称为维克多爵士,但他这个爵位是怎么来的,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的祖辈曾得到英国



的爵士封号,所以恭维他的人又叫他沙逊爵士”,似乎他的这个“爵士”只是人们为了拍他的马屁而随口叫叫而已。有的说他“世袭准男爵”,这么说有点含糊其辞。沙逊家族中共有两人被英国王室授予从男爵爵位,一个是维克多·沙逊的伯祖父阿尔伯特·沙逊,另一个是维克多·沙逊的伯父雅各布·沙逊。他所继承的究竟是哪一个人的爵位?事实是,雅各布·沙逊因为没有继承人,把爵位传给弟弟、维克多·沙逊的父亲爱德华·伊莱亚斯·沙逊,再传给维克多·沙逊。这个爵位一共传了两代就终结了,说“世袭”未免有点唬人。

许多作者在写到维克多·沙逊时,都说他“终身未婚”,其实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他是否结了婚还是查得到的。只是因为他大半辈子没有结婚,就沿袭很多年前的过时说法,这么做未免太偷懒了一点。

有位作者对旧上海的“风花雪月”颇有心得,可惜他对“跷脚沙逊”的描述有点随心所欲,罔顾简单的历史事实。在他的文章中,维克多·沙逊成了一个“金发红肤的小‘赤佬’”,在“本世纪(指20世纪)刚刚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乘坐“英营东印度公司的轮船”的“蹩脚的三等舱”,前往孟买“尽快结束在印度的新沙逊洋行的业务,然后去中国上海发展”。这位作者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维克多·沙逊是犹太人,而不是正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长的是黑头发,不可能是金发;在20世纪初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人,他的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变“跷”的;他结束新沙逊洋行在印度的业务的时间是1931年;他出生在富豪之家,虽然“老沙逊从不让后代成为靠在祖业上的纨绔子弟”,但他总不至于乘坐“蹩脚的三等舱”去孟买结束公司业务,况且时间已到了20世纪初,东印度公司还存在吗?

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读者提供有关维克多·沙逊的尽可能准确的材料,纠正一些误说和戏说。本书有关沙逊家族的一些说法,采用的是国外学者的观点,与国内的权威说法并不一致。比如上海

沙逊洋行的创立时间,国内的权威说法是1845年,但国外学者认为是1850年。上海开埠是在1843年,正式划定英租界最初的范围是在1845年11月,虽然当年有若干外国商行进入租界,但显然并不包括沙逊洋行。按照现代沙逊家族的奠基人大卫·沙逊的“后发制人”的处世原则,确定1850年是上海沙逊洋行的创立时间似乎更为妥当一点。

再比如,伊莱亚斯·沙逊另起炉灶创办新沙逊洋行的时间,国外学者认为是1867年,而国内的权威说法是1872年。大卫·沙逊于1864年去世,他的次子伊莱亚斯既然不甘居于大哥阿尔伯特之下,在父亲去世3年后、而不是8年后决定自立门户似乎更合情理。

国内学者在研究中,把新、老沙逊洋行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称其为“沙逊集团”,认为既然都是沙逊家的企业,必然关系密切,同进共退。事实上,整个沙逊家族对伊莱亚斯·沙逊创办新沙逊洋行的“叛逆”之举,表面上没有说什么,心底里却是极其反感的。在伊莱亚斯·沙逊自立门户之后,不但新、老沙逊洋行彼此之间没有业务往来,而且伊莱亚斯·沙逊与其他兄弟之间也很少有私人交往。甚至他们的后代所上的学校也是不同的。伊莱亚斯·沙逊的后代,比如他的孙子、本书主人公维克多·沙逊,在英国上的是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而伊莱亚斯·沙逊的兄弟们的后代上的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

由于客观条件和本人水平的限制,本书必定有诸多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没有郑西海先生的热情鼓励和大力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作者在此特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目录

第一章	星夜逃离巴格达	001
第二章	另起炉灶自创业	027
第三章	贩卖鸦片恶名扬	049
第四章	十里洋场赛马热	065
第五章	痴迷飞行落残疾	083
第六章	独具慧眼识上海	111
第七章	一鸣惊人建高楼	131
第八章	野蛮拆迁惹众怒	159
第九章	适时转战黄浦滩	181
第十章	镑券计划遭冷遇	199
第十一章	美国才女项美丽	213
第十二章	印度公主苏迈莉	251
第十三章	犹太难民蜂拥来	261
第十四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281
第十五章	耄耋之年终成婚	299

英国著名犹太史学家塞西尔·罗思(Cecil Roth)在《沙逊王朝》(*The Sassoon Dynasty*)一书中说:

人们通常把沙逊家族称为东方的罗思柴尔德家族。这两个家族毫无共同之处。首先,罗思柴尔德家族本质上是金融家,而沙逊家族本质上是商人,作为制造商是附带的利益。其次,罗思柴尔德家族齐整地分布在5个不同的中心,从未丧失其统一性;沙逊家族则凌乱地散布于东方各地。第三,这两个家族的背景和发展截然不同。罗思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人,他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西方,而沙逊家族从未离开亚洲(就其有可能确定的历史而言),直到他们在19世纪来到英国。可是,还有一种比这更重要的差异。罗思柴尔德家族出身平凡,这个家族第一个有据可查的成员是一个其祖辈也是普通人的平常的货币兑换商人,他在18世纪末发家致富。沙逊家族那时的祖先是巴格达的一个囚虏首领,在他之前的祖先也是如此。因此,当沙逊家族的年轻一代稍后来到了英国时,他们能够像从小就习惯的那样融入上流社会和宫廷,因此不像初看之下那么引人注目。他们与同时代的某些人不一样,不是忐忑不安的闯入者。他们就像利用与生俱来的权利,是故地重游。

然而,从巴格达到温莎,从沙逊家族即使在印度时仍然戴着的头巾和穿着的东方长袍,到他们在伦敦市中心帕尔马大街上漫步时所戴的高顶礼帽和所穿的礼服大衣,从他们以前如此娴熟地使用的阿拉伯语辞藻的丰富多彩,到英语散文的精炼简洁,其间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可是,这种转变是极其迅速地完成的,历史上确实没有其他家族能够企及。沙逊家族的奠基人大卫·沙逊是一位东方式家长,尽管与此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



商人。他的儿子们后来在伦敦社交界大出风头,属于围着国王爱德华七世打转的王室圈子内最著名的人物之列,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在成年之前,从来不知道穿着西方衣服的不舒适。他们的下一代进入英国议会,并与名门望族通婚。在沙逊家族显赫一时的第四代中,有英语最地道的当代英国诗人,有教养最出色的公共工程专员,也有其去世被认为是英国体育运动无可挽回的损失的障碍赛马骑手。这是一项令人诧异的纪录。哪个家族一个世纪前在其情趣方面可能更缺乏英国味道?又有哪个家族如今能产生更英国化的成员?

跨越底格里斯河两岸的巴格达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在波斯语里,“巴格达”一词意为“神赐之地”。公元754年,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发现这几位居水陆要冲,而且气候宜人,于是决定在原来小镇的基础上建造一座都城。公元762年,阿巴斯王朝正式在巴格达建都。

公元786年到833年是巴格达的繁盛时期。市区范围迅速扩大,各种建筑相继出现,人口规模超过百万,成为当时阿拉伯地区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和贸易中心。许多诗人、神学家、数学家和医生在巴格达定居。由于底格里斯河方便的水运条件,繁华的巴格达市场上摆满从中国运来的瓷器、绸缎和麝香,从印度和马来群岛运来的香料、矿物和颜料,从中亚等地运来的红宝石、青金石和丝织品,从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运来的毛皮、蜂蜜、黄蜡,以及从非洲运来的象牙。当时的巴格达与中国唐朝的京城长安、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并称为世界三大名城。

然而,如同其他世界历史名城一样,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巴格达城也是屡遭蹂躏,几经兴废。公元1258年和1401年,席卷西亚和欧洲的蒙古骑兵先后两次洗劫巴格达城。此后,巴格达又被波斯人占领,并于17世纪初成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到18世纪末,巴格达早已失去昔日的光彩,显得萧条和破败。

从古代起就有少量犹太人在印度和中国定居,但巴格达始终是这个流亡民族的神经中枢。到18世纪,在巴格达生活的犹太人约有一五六千名。他们已习惯于逆来顺受地接受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帕提亚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以及土耳其人的轮流统治。这是一个彻底阿拉伯化的群体,不仅他们的祖先在阿拉伯人中间居住已有上千年,而且他们使用阿拉伯语彼此交谈、举行宗教仪式和书写信件。他们的社交生活、烹调风格和风俗习惯与阿拉伯人如出一辙。他们不是巴格达最富有的人,大约2000名亚美尼亚人才是最有钱的。有人说,1个亚美尼亚人顶得上4个希腊人,而1个希腊人顶

得上4个犹太人。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但也有少数犹太人通过经商发了大财。

对巴格达的瓦利(当地行政长官)来说,任命一名犹太人担任首席财政官是一个惯例,也是一种双赢的安排。统治者有了一个负责为他收税的精明顾问,而犹太人也有了向官府倾诉民众冤屈的渠道,或者一旦某个官员变得过于贪婪时有了能伸出援手的保护者。担任首席财政官的通常是巴格达最富有和最受尊敬的犹太人,被政府正式承认是犹太人的“纳西”(Nasi),即“王子”。巴格达的普通百姓走得更远,称他是“犹太人之王”。“纳西”在巴格达犹太人的自我管理中扮演首要角色。他被称为“族长”,在犹太会堂中占据首席,主导制定约束犹太人的新的共同规章和法令,并且拥有处罚、甚至处死行为不端的犹太人的权力。

萨利赫·沙逊(Sason ben Saleh)就是这样一个“犹太人之王”。他出生于1750年,是第一个有确凿历史文献证明的沙逊家族成员。沙逊家族似乎是最早在巴比伦王国定居的犹太人之一,在中世纪的天主教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后,许多亲属从西班牙前来与他们会合。中世纪的文学作品经常提到沙逊家族,在注释和讲解犹太教律法的《塔木德》中,也能找到沙逊这个姓氏。沙逊最初拼作“Shoshan”,在希伯来文中意为“百合花”,后来简化成了“Sason”,意为“快乐”,再后来又演变成了“Sassoon”。沙逊家族的祖先之一是西班牙托莱多的名门望族,因其财富和学识而广受尊敬。早在17世纪,威尼斯学者亚伯拉罕·沙逊就自豪地声称,他是大卫王第五个儿子示法提雅的后裔。

从18世纪后期起,巴格达的反犹活动日趋加剧。1774年的一份法律文件载明,族长沙逊未能在一起民事案件中向犹太法庭提交某些文件,因为他“由于害怕本市的统治者”而躲了起来,不能公开露面。巴格达当时的瓦利奉行反犹主义。为了在情况紧急时能够逃生,族长沙逊在家中很厚的墙壁内修建了一条秘密通道。

与所有富于远见的商人一样,沙逊家族只是把最值钱的轻便物品,比如重要文件和货物样品,保存在自己家中。但是,在他们位于市区各处的百货店和售货亭,林林总总的货品总是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从数百英里外的布什尔(伊朗西南部港市)用木筏运来大包的丝绸,从印度和阿富汗运来棉纺织品、马匹和金银饰品,从海路或者更经常地用骆驼队从爪哇和新加坡运来一箱箱香料和各种小物件。大部分商品在巴格达本地出售,但沙逊家族几代以来已逐渐建立了皮革、海枣、金属以及首先是羊毛的庞大出口业务。只要开始剪羊毛,他们的代理商就会立刻活跃在内地的贝多因人部落中间,这个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出售羊毛,换取布衣、鞋子和



饰品。

沙逊家族的孩子们自小学习经商，每天一清早就被分派到人头济济的各个露天市场，报告商品的到达，关注市场的动态，同时学习以不同的货币、重量和尺寸计算货价。犹太男孩年满13岁时需在犹太会堂接受受戒礼——朗读部分《戒律》。这是他的成人仪式，意味着他从此需要承担宗教义务。沙逊家族的男孩在接受受戒礼之前，几乎都能流利地使用希伯来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当然还有经商必需的语言——波斯语。

萨利赫·沙逊于1778年成为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但在土耳其帝国的边远地区担任任何官职都是危险的，因为瓦利的无序更迭可能带来杀身之祸。有关萨利赫·沙逊我们知之甚少。他必定与他的许多子孙一样，是一个能力出众的人，因为他在艾哈迈德担任瓦利期间以及被解职以后，安然无恙地保住了首席财政官一职。艾哈迈德与处于土耳其帝国边远地区的大多数当权者一样，对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指令往往不理不睬，始终处于一种半叛逆状态。苏丹在经过数次不成功的尝试以后，最终得以重建权威，驱逐了艾哈迈德，以巴士拉的前瓦利苏莱曼取而代之。



沙逊商业帝国的开创者、维克多·沙逊的曾祖父大卫·沙逊。由于受到当局迫害，他连夜逃离世代居住的巴格达，接着又带着全家迁居孟买，终于开创在近代世界商业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沙逊商业帝国。

族长沙逊娶了商人、犹太会堂司库的女儿阿玛姆为妻。使他深感欣慰的是，她总共生了7个儿子。长子死于一场瘟疫，其他儿子乏善可陈，只有第二个儿子大卫出类拔萃，他是现代沙逊王朝的创立者。大卫·沙逊出生于1792年，当时他的家族的命运，实际上也是整个巴格达犹太社区的命运，已经处于剧变的转折点。

由于反犹太主义的日趋加剧，一些犹太人或者被迫放弃自己的信仰，或者决定离开巴格达。许多人前往波斯湾，从那儿乘船前往澳洲的新南威尔士，在悉尼建立一个讲阿拉伯语的小型犹太社区。然而，更多的犹太人渴望获得宽容的对待，并且享有贸易利益，纷纷迁居印度的加尔各答或者孟买。有人说，在英国保护下，犹太人既能不受排挤和鄙视，也能靠做生意过日子，甚至发财。

常驻巴格达的泰勒上校是英属印度三大管辖区之一孟买管辖区的代表，沙逊族长和儿子们经常与当地其他显要一起，上他的俯瞰底格里斯河的官邸做客，从而知道了印度的吸引力。

大卫·沙逊几乎刚能识字就显示出对经商的爱好，得到父亲的重点培

养。他在15岁时与一个富商的女儿汉娜·约瑟夫订婚，未婚妻比他小2岁。他将不得不等待11年，直到1818年才有了一个儿子和继承人。

大约1811年前后，在担任多年巴格达的瓦利后，苏莱曼公开造反，拒绝向苏丹提供金钱和军队。他被土耳其宫廷宣布为叛乱分子，并被缺席判处死刑。这种判决对苏莱曼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势力强大，足以抵抗任何军事进攻。所有代表中央政府前来巴格达的秘密使者都被他处死。族长沙逊继续恪尽职守，忠诚地为他服务。在这种事态持续大约10年后，苏丹的宠臣之一哈拉特·埃芬迪开始负责平叛行动。为了避免军事行动的开支和风险，他通过族长沙逊的主要对手、巴格达最富有的银行家埃泽基尔·本·拉赫尔设了一个圈套，诱捕了犯上作乱的苏莱曼。哈拉特·埃芬迪得意扬扬地将苏莱曼的人头送给君士坦丁堡的主人邀功。由于功勋卓著，他当上掌玺大臣，成了土耳其宫廷说一不二的人物，通过卖官鬻爵大发横财，毫无顾忌地把奥斯曼帝国各地的正式官职和报酬丰厚的挂名职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埃泽基尔与他一起回到首都，当上财政大臣。

在苏莱曼之后担任巴格达瓦利的是达乌德。埃泽基尔·本·拉赫尔的弟弟埃兹拉·本·拉赫尔依靠兄长的势力，当上了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取代了萨利赫·沙逊。然而，官场险恶，哈拉特·埃芬迪的飞扬跋扈引起了土耳其宫廷的内讧。1826年，哈拉特·埃芬迪和埃泽基尔·本·拉赫尔被捕，并且很快被处决。埃兹拉·本·拉赫尔也被撤职并且遭到囚禁。

这并不意味着族长沙逊会官复原职。实际上他过于年迈，已不能担此重任。但他的34岁的儿子大卫凭借父亲的威望和自己的努力，已开始接替他父亲以前在犹太人公共事务中所承担的角色，成了犹太社区非正式的领导和发言人。有关沙逊家族这个新首脑的童年、教育等等的记载寥寥无几。他想必与当时巴格达犹太人上层阶级的其他任何男性一样，接受了虔诚的犹太人的常规教育。可以确定的是，他精通多种语言。希伯来语是举行宗教仪式所用的语言，阿拉伯语是适应周围环境的语言，土耳其语是政府使用的语言，而波斯语是贸易所需的语言，这些语言他都能说。

显然，老族长沙逊有意让这个儿子步他的后尘，当上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和犹太人的“纳西”。在埃泽基尔和埃兹拉兄弟双双垮台后，老族长沙逊的梦想成真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但他未免大失所望。达乌德是巴格达历史上最残暴的瓦利。他对犹太人的盘剥和压迫远远超出他的诸多前任。根据事后估计，在他统治期间，由于他的暴政外加瘟疫、内战和洪水，巴格达的犹太人减少了大约八成。在依赖兄长埃泽基尔的势力当上巴格达首席财政官的埃兹拉垮台后，达乌德根本不愿意再让一个犹太人取而代之。他怀疑犹太人“纳西”会与自己的人民串通一气，威胁他的地位。何况他也觉得，直接



勒索比通过一个首席财政官征收重税更简便,也更有效。他计划有选择地逮捕一些有钱的犹太人,再让他们的亲属支付高额赎金。

大卫·沙逊比他年迈的父亲更坚强,决心主持正义。他的两个儿子阿卜杜拉和伊莱亚斯已接近13岁的成年年龄,除非他迅速采取行动,他们父子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前途。大卫·沙逊的第一个妻子已去世,过于频繁的分娩摧毁了她的生命力。后来他娶了一个商人和藏书家的女儿法尔哈·海耶姆为妻。

大卫·沙逊通过某种渠道得知,达乌德在土耳其宫廷已经失宠。他无视父亲要求他谨慎从事的规劝,毅然决然地上书土耳其宫廷,举报了达乌德的胡作非为和巴格达的严峻形势。此举无疑是向达乌德公开宣战。1828年,大卫·沙逊上书举报的消息传到了达乌德本人耳中。达乌德立即下令把他投入监狱。他知道老族长沙逊不会袖手旁观,坐等他心爱的儿子的伤痕累累的尸体被交给他埋葬。

萨利赫·沙逊请求达乌德宽恕自己的儿子,但这个暴君为了尽可能提高赎金的数额,摆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模样。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终商定了释放大卫·沙逊的赎金数额。这个数额是巨大的,而且附带一个条件:大卫·沙逊必须在获释后立即搭乘下一班船离开巴格达前往巴士拉,那儿当时由达乌德的一个下属统治。

这是一种危机四伏的安排。深谙官场内幕的老族长沙逊知道,如果达乌德决定将流放者重新收监,他们将是无力抗拒的。这笔赎金很可能只是一系列赎金的第一笔,达乌德很快就会再次逮捕大卫·沙逊,直到一而再、再而三的赎金将整个沙逊家族的财富榨干,而且,到头来大卫·沙逊仍难免一死。

大卫·沙逊获释以后,不可能冒险等候正常的班船离开巴格达,他担心达乌德到了明天就会背信弃义。就在他获释几小时后的当夜,他的父亲花费一大笔钱租了一艘船,并向船长许诺,只要他运送的客人安全到达巴士拉,他将得到另一笔同样数目的酬劳。大卫·沙逊拥抱了第一次婚姻留下的两儿两女以及新婚才几个月的年轻妻子,并再次向他父亲保证,他会立即离开巴士拉,不会冒险在那儿逗留。

只有等候的船长知道大卫·沙逊的真实身份。要是船上的阿拉伯船员得知这个个子很高、沉默不语的唯一旅客是巴格达犹太巨商的儿子,他们恐怕禁不住诱惑,会把他洗劫一空,再把他的尸体抛下茫茫大海。

经过大约一周的航行,大卫·沙逊终于到达海湾港口巴士拉。港口内停满帆船,船上满载来自中国 and 印度的丝绸、茶叶和香料。他把先前许诺的余款付给船长,忐忑不安地上了岸,唯恐一上岸就会被捕。在确认平安无事后,他找到当地的犹太人,参加了他们的晚祷。他很想留下不走,但他必须

遵守给父亲许下的不在巴士拉逗留的诺言。第二天午前，他再次登船航行。

几天后，他得知了自己的好运。达乌德在释放他后，立即派人搭乘下一班船，企图把他抓回巴格达，再从老族长沙逊那儿勒索又一笔巨额赎金。当达乌德的爪牙到达巴士拉海关并开始搜查居住在巴士拉的每一个犹太家庭时，逃亡者大卫·沙逊已安然到了达乌德鞭长莫及的波斯西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

他没有时间自我怜悯。他必须开始创业。虽然他的家族姓氏在布什尔的犹太会堂赢得尊敬，大卫·沙逊仍是一个新来的白手起家者。由于仓促的逃亡，他随身携带的资金很少。一些当地商人认为，一个来自巴格达富有的沙逊家族的成员以如此有限的资本做生意，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据说他在码头上的一间棚屋内度过最初几夜，用他的手枪驱赶四处乱窜的老鼠。无论这是事实还是传说，这种说法证明了大卫·沙逊的随遇而安和坚忍不拔，并不因为出身富豪而养成一身纨绔习气。当地生意兴隆、交游广阔的商人塞缪尔·扎卡里亚一眼看出大卫·沙逊颇有发展前途，免费提供给他一间小屋，慷慨地借给他一些资金，并为他的商业信用提供担保。

大卫·沙逊很快就在市场上打开局面，站稳了脚跟。他熟悉范围广泛的常用商品的季节性价格波动。他的另一个本钱是精通多种语言，甚至包括中亚一些山区的方言。说来令人奇怪的是，他缺乏学习英语的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意愿。虽然后来他成了大英帝国的臣民，但他始终不会说、更不会读英语。

他从向塞缪尔·扎卡里亚租借的一间很小的码头边仓库开始努力创业。停泊在布什尔港内的三角帆船的船长们逐渐知道，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的话一诺千金，是值得信任的。他的资本不断增加。他开始买下码头空间，然后出租给通过海路或者陆路买卖货品的商人。他宁愿充当中间商，而不是独立地与资本更雄厚的当地商人竞争。他谨慎地开始向印度出口少量马匹、椰枣、羊皮和珍珠，并从印度进口丝绸和金属器皿。由于他既没有船舶也没有骆驼，这种进出口生意的规模是有限的。

他的虔诚和学识赢得了当地犹太教徒的尊重，但他的流亡生活是孤独而凄凉的。他得知长子阿卜杜拉将很快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接受受戒礼，这使他黯然神伤。但是，他很快欣喜地得知，他的父亲计划举家搬迁，前来布什尔与他会合。

有关沙逊家族这次迁离巴格达的详情后人知之甚少。沙逊家族在巴格达居住了这么多世纪，沙逊族长又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向官府支付大量贿赂，他的搬迁计划是保不了密的，此次行动也就没有了安全保证。只有极小部分家族财富得以带走，留下的钱财则帮助了巴格达许多穷人幸免于此后



很快发生的每天使4000人死亡的一场灾难。当时底格里斯河洪水泛滥,淹没巴格达城,许多房屋毁于一旦。

长途跋涉严重损害了80多岁老人的健康。1830年初,就在他的长孙阿卜杜拉接受受戒礼之前,萨利赫·沙逊在儿子大卫的怀里平静地死去了。



孟买的印度之门,意为进入印度的门户。当大卫·沙逊率领全家迁居孟买时,当然还没有这座印度之门,但他的孙子、维克多·沙逊的伯父雅各布·沙逊曾为建造印度之门出资。印度之门建成于1924年,耗资210万卢比,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

大卫·沙逊已经注意到了印度的魅力,那儿显然能为他的子女提供比在闭塞落后的布什尔更好的教育。当他因为经营上的一些事情访问孟买的一些生意伙伴时,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这个发展迅速的城市的念头在他的内心油然而生。孟买现在是与海湾所有港口以及东非进行贸易的天然中心。他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在印度与波斯之间经营双向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光辉前景。

孟买最初是作为葡萄牙布拉干萨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王查理二世的嫁妆的一部分被英国占有的,查理二世把孟买以每年1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东印度公司。据说由于一年两次季风,欧洲人很难适应孟买的生活。可是,对像大卫·沙逊这样的移民来说,能够免受巴格达的酷热和尘土的煎熬已是谢天谢地。更何况为了孟买的宗教自由和英国国旗提供的保护,他们愿意接受更大的风险。

在像布什尔这样邋遢的小港口呆过一段时间后,孟买显得像是一个广阔无比的市场。与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和尔虞我诈盛行一时的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不同,孟买的教徒、穆斯林、犹太人和印度人全都和谐相处,融洽地彼此做生意。犹太人移民主要居住在由密集的小巷组成的一个不大的地区。大多数人生活依然贫困,但因为逃脱了达乌德的迫害而无比庆幸。由于人生地不熟,大多数犹太人满足于在他们自己中间缺乏热情地做生意。

大卫·沙逊在塔马林德胡同找到一所小房子,楼下用作办公室和仓库,而楼上住人。他兴奋地返回布什尔,向当地商人打听丝绸、棉纱和金属的销路,并提出将向他们发送这类货物。他也接触了有可能向他供应波斯商品的商人。一些阿拉伯船长允诺,他们的帆船一到孟买就去找他。当他的妻子向他吐露已怀了头胎的好消息时,这看来是一个在孟买开始新生活的好兆头。但他对迁居孟买仍犹豫不决。最后的决定是在一个星期六夜晚做出

的。塞缪尔·扎卡里亚父子与大卫·沙逊夫妇一起从犹太会堂回来，半路上被一个算命先生拦住。这个算命先生坚持要为大卫·沙逊看手相，并奉劝他立即动身前往印度，他和他的孩子们必将在那儿发大财。算命先生的一番话终于使大卫·沙逊打定了主意。在很短的时间内，扎卡里亚一家为他备齐了他将带走的一船货物，并把他全家送上了驶往孟买的帆船。这船货物足以堆满大卫·沙逊在孟买的第一个仓库。

有关扎卡里亚家族与沙逊家族之间这笔交易的正式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但从流传了一个多世纪的故事和信函中能找到蛛丝马迹。各种版本略有不同。根据沙逊家族的说法，塞缪尔·扎卡里亚借给他们的祖先大卫·沙逊一笔1000卢比(当时大约相当于1000英镑)的贷款，不用付息，甚至没有写借据，而大卫·沙逊在3年内全部归还了贷款。扎卡里亚家族的后人断言，他们的先辈交给大卫·沙逊的是一笔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赠款，因为这将有利于两家公司之间的买卖。但是，扎卡里亚家族未能像沙逊家族那样大富大贵。他们的一些子孙后来只能在沙逊家族的公司打工。几乎从大卫·沙逊第一次把“门柱圣卷”钉在塔马林德胡同9号门口的那一天起，他的公司就生意兴隆，财源滚滚(“门柱圣卷”是一面记有《圣经》文字、一面写着神的名字的羊皮纸卷，一些犹太家庭将它装在盒内挂于右门柱上，以示自己的信仰)。

1832年初，在孟买私人商业磅礴发展的前夜，简陋的沙逊洋行在塔马林德胡同9号正式开张营业。沙逊洋行的正式名称是大卫·沙逊父子公司(David Sassoon & Sons Company)。“沙逊洋行”其实是后来在中国开设分行时的中文名称，因为中国人当时习惯于把外国人开设的商行称为洋行。姚公鹤在1917年出版的《上海闲话》一书中说：

惟自中西国际交通以来，称外人为洋人，称舶来货为洋货，称墨(墨西哥)币为洋元，称外人所设之店业为洋行，标以“洋”字，盖别于“华”而名之也……其洋行之称，滥觞于广东之十三洋行，然彼时系指洋行为华人代销洋货之名称。今则凡外人所设之营业，统名曰洋行，此其稍异者。近时日本小商人开设之牙粉、蛋饼等店，门首亦悬挂某某洋行，则究竟洋行营业有无范围，既无法律上之规定，亦一任自由而已。

当孟买敞开胸怀欢迎大卫·沙逊及其家人时，它是一座新兴城市。在过去一年里，孟买的迅速发展不亚于处在扩张全盛期的某个美国中西部城镇。当孟买在大约200年前落入英国人手中时，它只是一个拥有大约1万名居民的小镇，据说其中大多数是逃犯和游民。到沙逊洋行开张的1832年，孟买已有20万人口，包括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帕西人、葡萄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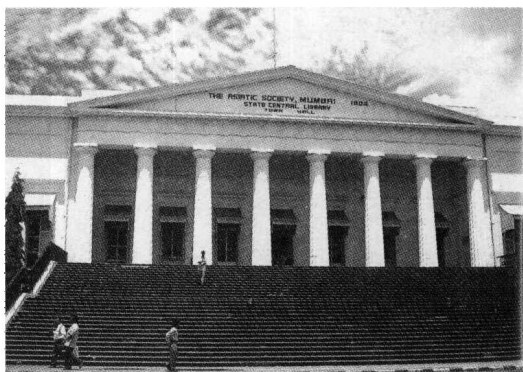


混血儿、少量欧洲和本地的军人以及为数不多的英国人。

张仲礼、陈曾年在《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一书中说：

大卫·沙逊看中孟买这个新兴港口是有其道理的。首先，产业革命后的英国，棉纺织业迅速发展，兰开夏生产的棉制品，英国国内市场已无法销纳，便大量通过孟买运销印度腹地，孟买已成为英国对印度贸易的孔道。其次，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当时正极力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希望英国的商人能在世界各地更好地倾销英国商品，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作用。由于工业资本家的倡导，1833年8月，终于在改革后的英国议会里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1834年4月22日，英国政府正式废止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除上述两点外，英国国内的某些人士，当时正在鼓吹不应对待犹太人采取歧视的态度，而积极支持这一观点的是罗伯特·格兰特爵士(Sir Robert Grant, 于1835年担任孟买的总督)。这些因素使大卫·沙逊感到在孟买创办企业前途无量。

大卫·沙逊欣赏孟买的友好气氛，但并不急于与历史更悠久、根基更扎实的商人们竞争。虽然他来到孟买时并非身无分文，他经商的态度是谨慎的，规模也较小。开张伊始，他只是继续做先前在巴士拉做过的生意，微小的差别在于，以前他人在波斯，从印度进口货品，而现在他人在印度，向波斯及其邻近地区出口货品。波斯需要英国的棉纺织品，而英国出口商也十分愿意以棉纺织品换取他的皮革、丝绸、香料和珍珠。巴格达的统治者达乌德终于被驱逐了，大卫·沙逊也重新开始了与他的出生地的贸易，不久之后还派遣长子阿卜杜拉前去巴格达监管那儿的生意。较之竞争对手，尤其是欧洲人，他从一开始就享有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他了解直接与之贸易的国家，熟悉当地情况，精通当地语言，在当地有他能信任的代理商(当然是犹太人)。他的生意因此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很快成为印度从事海湾贸易最大的公司。



孟买市政厅，建成于大卫·沙逊举家迁居孟买的次年(1833年)。1878年，埃尔芬斯通勋爵站在孟买市政厅台阶的顶部，宣读英国女王关于终止东印度公司统治的公告。

大卫·沙逊深知海运在他的进出口业务中的重要性。他开始用最初的利润买下孟买的码头，并与川流不息地驶入孟加拉湾的三角帆船的船长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向